

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政治载体与本质特征^{〔*〕}

朱新山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既需翻过传统中国历史之旧篇,又需在当代中国不断开拓出新局。然而,此两者任务都极为艰巨。传统中国是由小农经济、帝国政治、儒家文化、士绅社会组成的四位一体、互为强化的有机整体,决定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整体性的大转型,转型将极为艰难。传统中国既有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士绅、官僚,还是小农、商贾,无一能够肩负支撑中国社会转型的使命。中国艰难的社会大转型与实现现代化都呼唤有效的政治载体,即现代政党之诞生。而越是后发的国家,越需强大的现代化推动力量。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世界上内外情形交织最复杂、人口规模最巨大的现代化,是需要具有最强推动力量的政党领导的现代化。历史证明,翻过旧篇与开拓新局均需政党主导,由此内在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载体;本质特征;党的领导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10.005

现代化是社会从传统往现代的转型过程。传统中国作为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是由小农经济、帝国政治、儒家文化、士绅社会组成的“四位一体”、互为强化的有机整体。近代以来,其遇到了根本性挑战,必须整体性转型(不容局部转型),遂使中国现代化初始就遭遇重大难题。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需要有效的政治载体

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翻过历史旧的一页的问题。然而,传统中国“四位

一体”的文明形态,高度成熟、高度稳定,历两千年而不变。总体看,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作为传统中国文明形态的基础构造,在其上逐步生长出以伦理为本位的有远近亲疏的差序型社会结构。此种社会结构,需要“贤能型”(而不是“选举型”)的代表机制与管理体制,因而与之相因应并矗立其上的为穿长袍的士人阶层及其与皇帝组成的帝国政府。长期作为传统社会领导中心的士人阶层,往上领导政府,于下领导社会,他们组织传统中国之工具则为儒家文化与家

作者简介:朱新山,法学博士,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与东华大学繁荣计划预研究项目“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2020Z002)的阶段性成果。

族机制。而儒家文化以人际协调为中心,讲究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成为编织中国的有效工具。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能够深度结纳小农经济与帝国政治为一体,成为统辖社会各个层面人们行为举止的观念体系,成为传统中国人集体认同的基础。因此,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帝国政治、儒家文化、士绅社会,四者就形成内部逻辑自洽并互为强化的有机整体。

作为有机整体的传统中国文明形态,其任一组成部分都难以转型,要转必须整体性转变,因而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难度之大完全可以想象。黄仁宇就指出,近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即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1]在西欧与日本,以商业市场条理治国可从社会的中间阶层发动,工商之人可作有效之贡献,中国则需将此条理加于成千上万的官僚或数以亿计的农民头上。而中国自古有君子不言利与贱商的传统,社会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商法(传统中国法律事实上是刑律),种种阻碍使得现代性因素始终难以萌生。^[2]因此,来日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纷纭复杂、旷日持久,也会伤筋动骨、悲痛惨切。

首先遭遇难题的是帝国的政治形态。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说明原来赖以立国的帝国制度受到了根本挑战。而皇帝唯我独尊,无视民权,天下系于一人,是帝国制度之根本,也是帝国制度之通则与表征。^[3]因而救亡之路唯在改制,即变皇权专制为民主法治。但是,传统中国的固有观念一向注重男人优于女人、年长的优于年幼、官员优于百姓,这和民权原则以及每一个人都有同等机会大相径庭。也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制度、规则,均与民主格格不入,无一可资改造利用。

更为基础的阻碍则为差序型文化。儒家文化主张“爱有差等”,鲜明彰显亲疏、尊卑、上下“差序”。陈寅恪认为,“‘三纲六纪’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定义”。^[4]受儒家文化长期熏染的传统中国人,习惯依照人伦关系的远近亲疏办

事,而现代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则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可见,两者差距之大,判若云泥。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更为艰难。民国初年,中国出现意欲彻底颠覆传统伦理的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中国的士人阶层也不能与时俱进,开展自我革命。西方国家如英国及中国的近邻日本,转型之所以较为顺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支撑社会转型的轴心力量——贵族。英国的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联手,成功地限制了王权,实现“虚君共和”。在日本,推动明治维新事业取得成功的主力也是武士贵族阶层。^[5]而中国近代则缺乏支撑社会转型的轴心力量。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小农为主体的散漫平铺之社会,始终缺乏制衡皇权的社会力量。中国的近代史表明,士大夫也不能支撑中国社会转型,因为通过“科举取士”士大夫已与传统体制深度捆绑。蒋廷黻就指出,传统文化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生命线,传统文化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难怪他们要反对新政。^[6]另外,清朝皇室作为旧制度和旧结构的既得利益者,更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支撑力量。清室冥顽不化,不像英、日能实行君主立宪,终被推翻。

近代以来,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中国志士仁人的救亡之路均不顺,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轴心领导力量。众所周知,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一轴心领导力量,就是士人阶层。士人阶层的稳定性和常规继替保证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然而,近代以来,士人阶层的蜕变和瓦解,则使政治失却重心,中国社会陷入旷古未有的整体性危机中,不得不进行艰难的社会大转型。钱穆就指出,近代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一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7]从而支撑中国社会转型。

由于农民始终是中国社会人口最多和最为基础的力量,中国社会的大转型需要有效组织农民。在传统中国,帝国政治、小农经济、儒家文化

与士绅社会四者中,最具韧性的则为以小农为代表的农民阶层。然而,农民阶层却天然地具有自由散漫的弱点,其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由社会自发力量,变为颠覆旧社会和助推中国转型的主体性力量。然而,中国农民要组织起来,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推动力量,而这一推动力量就来自于现代政党。

毫无疑问,政党既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又是现代化的推进工具。亨廷顿就指出:“政党是一种现代化组织。”^[8]越是难以转型的社会,越需现代政党,尤其是强大的政党。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以“天下太平”为目标,而不以“发展”为目标,统治当局开创治局与维系社会更多依靠伦理纲常而非组织力量。因而,中国推进现代化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相当匮乏。陈明明认为,为推动社会转型,摆脱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的内外困局,中国需要发动一场“组织革命”,^[9]而组织化最直接、最有效且最具“现代化”的方式就是组织政党。而社会危机越严重,越需更强大之政党与政党体制。无疑,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是整体性危机与整体性社会大转型,而既有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士绅、官僚,还是小农、商贾,无一能够肩负起支撑中国社会转型的使命,因此,组织力量最强的“革命党”在中国的出现就具有必然性,即中国需要强大政党作为支撑中国社会转型与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载体。

孙中山最早开始探索建设“革命党”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之实践,并提出“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之主张。然而,其所建“党”仍具有“会党”性质,动员组织能力甚弱。第一个在“革命党”建设实践上取得突破的则是列宁。列宁领导的苏俄革命的经验是建立拥有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即革命政党)并由党创建国家,然后,以党领政,以党治军。列宁1904年就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靠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保证的。^[10]受列宁成功的“组织”实践启发,孙中山1924年开始“以俄为师”,对国民党进行改组。

然而,天不假年,他1925年就去世了。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逐渐被改造成为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工具。然而,蒋的独裁虽属“强人体制”,但其权威结构的重大缺陷是具有浓厚的庇护制与私人裙带关系特点,缺乏完整有效的意识形态支持,且难以克服日益腐败的倾向,^[11]这决定了其高度脆弱性与过渡性。另外,国民党走上层路线,不能深入中国底层社会进行动员。正如孔飞力所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许多方面是现代化城市文化的产物,其与广大乡村是对立的。^[12]因此,国民党就像一个寄生性的外壳,漂浮在社会的表面,难以肩负起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重任。

真正掌握马列组织理论精髓并针对中国情况活学活用的,则为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13]列宁最看重组织,认为组织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对列宁组织理论深有研究的亨廷顿,曾引用列宁原话来阐释其中真谛:“我们的战斗方式是组织,我们必须组织每一件事。”^[14]政党通过组织,不仅能集中权力,而且也能扩大权力,从而才能肩负起伟大使命。列宁用其建构发展的组织理论武装工人,走城市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则创造性的将马列主义的组织理论,用以武装作为人口主体的农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无疑,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的政党组织原则贯彻得更为自觉与彻底,充分发挥了政党的政治动员与组织功能。在社会基层,国民党所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共产党则直接依靠农民、组织农民,直接把党的治国理念传达给人民。这样,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有动员资源与整合社会的能力,因而就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而革命胜利后,党的领导也自然成为社会整合与国家建设的决定因素。党用其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动员每一阶层每一领域,彻底改造社会国家各层面。^[15]这样,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

与现代化的有效载体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了中国需要组织起来的时代要求,从而肩负起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艰巨使命。可见,翻过传统中国之旧篇,彻底扭转近代以后中国悲惨之命运,是依靠身为强大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来实现的。

二、后发国家要走有效政治权威驱动的现代化路子

翻过历史旧篇不易,开创现代新局亦难。开创新局不仅需要探索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子,而且需要踔厉奋发、不断革新以提供现代化源源不竭之动力。无疑,翻过旧篇、开创新局,是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可能遇到的,但有些国家的转型经历更为曲折。

时至今日,世界经历了五波现代化浪潮。第一波浪潮是社会自发型的,其后,现代化均需国家推动,而且越是往后越需要更为有效的政治权威和更强的推动力量。

英国是世界现代化的先行者,是第一波,走的是内源自发型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研究专家普尔就指出:“在英国,一个几乎摧毁了传统农业、将自己从封建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羊毛贸易中积累了资本的强大的企业家资产阶级,开始了工业化,不需要国家在此过程中积极介入。”^[16]英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主体是民间资产阶级(民间企业与民间力量),在那里,个人从传统束缚下的“解放”以及现代社会需要的“纪律与控制”,也是企业家与市场机制即那只“看不见的手”所给予的,而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不过,英国的现代化模式事实上是特例,其他国家很难简单模仿。因为英国率先实现现代化,就对其他后发国家形成了压力,它们很难从容等待社会中的现代化因素自发地缓慢萌生,也即所谓“现代化后进国家急需政府主动积极地寻求经济增长”。^[17]因此,相对落后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就和英国有所不同,在这里,科层式官僚制度即国家的作用开始突出。

在法国,大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拿破仑将革命的成就与科层制的功效调和起来,“创立了现代的官僚政府的国家”,“从那时起,法国一直由‘高级官员集团’的官僚上层治理着。”^[18]而在更为落后的德国,国家作用就更为显著。“当日耳曼各处领土上的工业化处于起步和最初阶段时,国家官僚,特别是普鲁士的官僚,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替代没有或者缺少企业家干劲的资产阶级。”^[19]法国与德国是世界第二波现代化的代表性国家。在这里,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是科层官僚、国家银行(如法兰西银行与德意志银行)。而美国的现代化事实上身处第一波与第二波之间,独立后新建的美国联邦政府将在英国已证明行之有效的现代化做法,如股份募资及专利机制迅速引进来。美国的问题是,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曾发挥的重大作用往往被忽视或选择性遗忘。日俄则是现代化第三波的代表性国家,它们的现代化起步比中国早了40年(中国起步后更是长期步履蹒跚),其显著特点是国家开始制定现代化计划并着力推行现代产业政策。查莫斯·约翰逊就指出,引导日本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力量不是市场,而是日本政府的通产省(MITI)。^[20]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则是世界现代化的第四波。1961年朴正熙政变上台后,在韩国建立了权力集中的强势政府,进而依靠集权的政治框架来力推其工业化政策,即所谓的“指导资本主义”模式。^[21]他创建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比日本的通产省作用更突出),提出“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22]顽强追求国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目标。

目前,中国正在开展的现代化建设,是世界现代化的第五波。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在清末开始起步,但1949年以前,中国聚焦现代化目标的各项政策皆是短命的,取得的成绩相当微薄,可谓“是轻敷在古老文明表面的一层粉饰”。^[23]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长期存在严重短板,即缺少一个能够动员资源与整合社会的中央集权的有效政府。无疑,清政府缺乏将其控制权通过中下

层官僚机构伸展到地方一级的能力。^[24]而当19世纪遭遇严重外来挑战时,地方势力更是乘势坐大,其结果是军阀割据,国家“政治权威”普遍“瓦解”。^[25]随后的中华民国,更是深受中央政权衰微之苦。^[26]民国政府长期处于内卷状态,实际上其统治还不如清政府有效,固然清政府能够行使权力的范围,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27]著名现代化研究专家罗兹曼指出: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的转折点,恰恰是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真正彻底地决裂了。^[28]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计划性与组织性很强的别具一格的现代化模式,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政治学家福山也认为,中国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建立了“高效的国家”,^[29]即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为现代化目标而对技术与资源,进行积极而有计划的动员。虽然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对原有体制进行了深刻改革,但“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现代化的那些基本的典型因素依然如故”。^[30]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突出特征,是组织与动员能力最强的强大政党驱动。

无疑,国家(政府)与社会(市场)均可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源。但英美国家的传统是对政府(国家)始终保持高度戒心,从而往往忽视或低估国家的作用。而亚洲经济体如日韩,之所以能够创造惊人的发展速度与迅速实现现代化,恰恰就在于充分发挥了政府作用。深刻洞悉其中真谛的日裔美籍政治学家福山,就颇值得玩味地说:“盎格鲁—美利坚传统过分热衷市场导向的经济,这让美国人既看不到政府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所遵循的经济原则与新古典主义大有区别。”^[31]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之所以能更上层楼,也恰恰在于中国原有的党领导下的强势政府不仅未削弱,反而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上变得更突出(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而全力“拼经济”),同时,又充分拓展并利用了市场作用。可以说,是打造了“强国家(政府)”与“强社会(市

场)”的“双强”现代化推动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忌讳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能形成推动现代化的有效政治权威。20世纪60、70年代在亚洲发展排名仅次于日本的菲律宾,就是由于此等原因致使国家发展陷入“长期停滞”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亨廷顿就指出,菲律宾在“国家建构”上面临着若干重大的棘手的“情境问题”,包括“重大的叛乱(存在伊斯兰分离势力与‘新人民军’的叛乱等)、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巨额外债”,^[32]等等。这些“情境问题”越多、越严重(菲律宾全部具备),说明国家建构越不成功,国家能力也越弱。正是因为国家的最本质特征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33]当一个国家四处存在暴力活动,普通民众走在街上都担心遭恐怖分子绑架时,就可说,这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是比较失败的。^[34]时至今日,菲律宾一直存在地方势力活跃与中央权威不足的国家结构上的紧张。结果是菲律宾地方社会被世袭家族控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插不进去,而不同家族和帮派之间经常发生血腥冲突。

另一个“国家建构”比较成问题的大国是墨西哥。经过独立战争,墨西哥早在1821年,就结束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独立建国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独立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应该成为发达国家了,但墨西哥却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墨西哥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毒品犯罪猖獗,控制毒品生产销售的众多黑帮势力经常大打出手,形成地方割据。墨西哥黑帮势力的厮杀可谓血雨腥风,仅仅从2016年到2019年,墨西哥被谋杀的人数就高达惊人的12万。^[35]到2020年,有一半左右的墨西哥领土都被大毒枭(“毒品卡特尔”)实际控制了。虽然从2006年开始,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就发起了“缉毒战争”,但结果是“毒品卡特尔”越打越强,政府却越打越弱。^[36]今天的墨西哥,正代表了一种国家力量被分散的社会力量瓦解的情形,表征了国家能力的低下。

无疑,“国家”是一种伟大的人为建构,而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恩格斯就曾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37]对很多国家来说,它们至今还在为这一建构过程苦苦挣扎。^[38]当然,有成功国家建构历史的国家,其国家能力在不同时期也可能有很大起伏。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国家的推动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领导型现代化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建政具有标志性,从此全国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新建之政府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资源与实施政策的有效、强大权威。中国长期存在的现代化障碍遂得到克服,包括在国际关系中恢复了完整主权,强有力的国家开始指导着各个方面的社会变革,旧社会的差序型社会结构与特权观念受到了彻底的革命涤荡(最终形成了现代社会要求的平等主体的竞争格局),现代经济增长的各项必要条件由此得到满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遂展现出强劲势头。

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其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可以说,推动中国现代化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念兹在兹、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著名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头40年(1949—1989)而论,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39]当然,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在克服了原有体制较为生硬的弊端(譬如,硬性分配劳动力)、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与释放市场潜力后,中国经济更是进入连续超过40年的超高速发展状态,到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十年,中央则以更大的魄力全面协调深化改革,勇毅前行,推动中国如期实现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突出特点,是政

党领导型现代化。无疑,“现代化与政党”之间高度关联。传统社会无政党,现代化中社会才需要政党,因为政党是现代化的推动者。亨廷顿就指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40]当然,相比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追求更为自觉、更为执着,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力就更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长期奉行赶超型或超前发展战略。^[41]毋庸置疑,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第一,拟定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与行动步骤。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赶超”战略的定位和步骤设计,有着内在连贯和明确的承接关系:从战略定位看,先后提出“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阶段性的战略目标;从战略步骤看,先后做出了“两步走”“三步走”“两个一百年”“两个十五年”等战略部署和科学性安排。^[42]为保证既定的现代化战略与步骤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坚定实施了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从1953年迄今,从未间断。所有这些举措,目的都是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第二,凝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亨廷顿指出:相比“选举和议会是代议工具,政党则是动员工具”。^[43]现代政党的强大功能是动员,解放前中国共产党的突出功能是革命动员,建国后则是强大的生产与建设动员。可以说,积极高效动员技术、人力与资源,就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因素。就以改革前为例,高额资金积累率和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率,从1949年到1980年,除了短期的中断外,持续了30年。^[44]当然,改革开放后,除了动员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积极建立起现代化建设主体的人员激励与要素激励机制,中国的现代化动力就呈

现出更为全面、更为澎湃的局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地方政府之间引入了竞争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全力“招商引资”“拼经济”,可以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上的作用并不弱于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进入新时代后,各级地方政府正由原来较为单纯的GDP竞争,转向更为深层与更为基础的“服务”竞争上来,即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创造更为优质的现代化发展环境。

第三,强化现代化人才支撑。著名政党研究专家萨托利认为,“一元体系中的政党是选拔的工具”。^[45]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已经形成一套非常成熟、效率很高的人才识别、培养与选拔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蓬勃发展势头,重要原因即在于党和政府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出日益壮大的现代化建设人才队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人才问题有深刻认识,其认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46]始终抱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四,构筑更为基础的现代化驱动与保障制度体系。邓小平早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7]通过制度而不是人的因素,来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更为可靠。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开始突出强调和有计划地展开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即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努力“建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48]以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社会活力的持续释放。譬如,经济领域着力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央提出要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49]无疑,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加强产权保护,对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其以高昂的

热情投身现代化建设作用巨大。

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位,社会主义则以劳动即人民为本位。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始终立足人民,造福人民,追求建立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公正与更加富足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50]鲜明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方向。罗兹曼认为,依靠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能排除那些更加自私自利的精英分子发动的挑战,从而调动巨大的资源来增进国民的福利”。^[5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则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的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52]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搞两极分化,而是追求全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鲜明体现社会主义底色。然而,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并不具有方式的唯一性与必然性。德国著名学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就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具有“偶然性”,他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一直依赖于一些非常偶然和不稳定的支持力量,以及惯例性的事件和制度”,今天“资本主义只是幸运地生存了下来”,^[53]又面临着新一轮可能将其终结的全面深刻危机。因此,中国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就具有自身历史逻辑展开的必然性与崇高的人类道义性。

概而言之,近代以来中国艰难的整体性社会大转型,呼唤有效的现代化政治载体,而政治载体问题之解决,则从根本上内在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领导型之本质特征。实践证明,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政治权威越有效,越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出现挫折,教训尤为深刻。

注释:

[1][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97年,第5-6、235-236页。

[3]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5页。

[4]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页。

[5]戴季陶、蒋百里:《日本论日本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3页。

[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3-24页。

[7]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7页。

[8][14][40][4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1、278、337、336页。

[9]陈明明:《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0页。

[11]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12][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8页。

[13][4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333页。

[15]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16][18][19][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13、318、321页。

[17][24][28][30][44][5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5、649、598、672、601、605页。

[20][31][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21][22]罗荣渠:《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9、168页。

[23][26][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28、205页。

[25][27][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4、80页。

[29][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6页。

[32][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07-308页。

[3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1页。

[34][36][38]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58、155、174页。

[35]Jack Harrera, "The other epidemic", *The Nation*, 18 May, 2020.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39][4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12、513-514页。

[42]李鹏:《中国式现代化——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经济理论的研究》,北京: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年,第240页。

[45][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4页。

[46][50][5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3、22、22页。

[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0页。

[4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53][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